

约翰·济慈十四行诗的叙事、隐喻与意象

Narrative, Metaphor and Images: An In-depth Research into John Keats' Sonnets

孙 毅 (Sun Yi)

内容摘要： 约翰·济慈是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坛的代表，其诗歌独树一帜地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所感所思，对英国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济慈十四行诗中富含各种隐喻叙事意象，这些意象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描摹出一幅幅萧索悲凉、凄美震撼的画面，折射出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传递了诗人对舒适、恬静生活的向往。隐喻是诗歌的立身之本，意象是诗歌审美的灵魂。借助当代隐喻学探究诗歌意象可以发现，隐喻叙事是人类组织故事情节、行为和思考的一种方式。济慈十四行诗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其从生活中俯拾皆是的隐喻意象出发，基于叙事结构来书写饱蘸丰沛寓意的诗篇。

关键词： 济慈；叙事；隐喻；意象

作者简介： 孙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隐喻学与认知叙事学。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 2021 年度科研招标重点项目“约翰·济慈十四行诗的当代隐喻学阐释研究”【项目批号：CSY-2021-ZD-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Narrative, Metaphor and Images: An In-depth Research into John Keats' Sonnets

Abstract: As a brilli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itish Romantic poets in the 19th century, John Keats developed his own unique style, comforted the dry and withered soul with poetry, and dwelt in the world by composing lyrics, which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British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is sonnets were abundant in metaphorical narrative images, which sketched myriad entities in the world and depicted numerous bleak and sad, heart-breaking and shocking scenes that mirrored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all living beings and reflected their ideal for a comfortable and tranquil life. Metaphor is the foundation of poetry, and images are the essence of poetic aesthetics. We resorted to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for an exploration and uncovered that the metaphorical narrative is an approach for human beings to organize and conceive of behaviors

in plots. The marvel of Keats' sonnet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se sonnets, starting from metaphorical images that are ubiquitous and omnipotent in daily life, help weave fascinating and intoxicating masterpieces depending on narrative structures.

Keywords: Keats; narrative; metaphor; image

Author: Sun Yi, is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and cognitive narratology (Email: sytony9728@163.com).

国内外学者对济慈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性挖掘和阐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长诗和颂歌上¹，短歌十四行诗的相关成果寥若星辰。十四行诗最初源自意大利，又称商籁体诗，是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体诗。13世纪末，十四行诗的领域由抒情诗扩展至叙事诗、教谕诗、政治诗、讽刺诗，这不仅为深入探究济慈诗歌的美学价值、提升全新的美学境界提供了优裕条件，还为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进步夯实了基础，开拓出广袤空间。基于此，本文聚焦于济慈十四行诗，以隐喻意象为视角，以叙事为途径，以意象链构建为手段，以中国翻译家屠岸的《济慈诗选（英汉对照）》为语料，结合当代隐喻学理论，着重分析其中十四行诗的叙事意象，力图补苴罅漏，在研究济慈诗歌的同时进一步阐明隐喻与故事、叙事的相互关系，诠释隐喻叙事的认知、情感和语用三重功用。

一、故事、隐喻与叙事

叙事和隐喻既是理解世界的方法，也是理解世界的机制。Snaevarr 区分了叙事和故事：“故事是正在被叙述的东西，独立于所使用的媒介。叙事是故事被讲述的方式（……）叙事（或话语）是能指，故事是所指”（168）²。隐喻、故事和叙事紧密相关。故事中的时间、地点和背景为完整的叙事提供了相关元素，独特的叙事方式又为故事的呈现增添了活力。隐喻丰富了故事内容、深化了故事内涵，而叙事是对故事内容的解读，体现着故事的视角和观点。因此，故事是唯一的，但叙事却是多样化的。故事是隐喻性的，而隐喻又隐含着叙事。³ 在诗歌中，隐喻阐述并澄清所叙故事的特定观点，叙事则通过建立

1 参见 Walter J. Bate, *John Kea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Susan J. Wolf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罗益民、刘佯：“长诗传统与济慈诗歌中的拓扑学空间构建——以《恩底弥翁》的得失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2021）：71-91+15等。

2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3 参见 David L. Ritchie, “Gateshead revisited: The Integrative Function of Ambiguous Metaphors in a tricky Political Situ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1 (2008): 24-49; David L. Ritchie and Char Schell, “‘The Ivory Tower’ on An ‘Unstable Foundation’: Playful Language, Humor, and Metaphor in the Negotiation of Scientists’ Identities,” *Metaphor and Symbol* 2 (2009): 90-104.

各类隐喻意象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来反映诗歌意象。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厘清隐喻、故事、叙事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把握隐喻概念化和特定文本结构之间的交互性关系。

（一）隐喻和故事

对隐喻的最早认识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在文学作品中，隐喻常以比较、类比或简化形式存在。而在认知科学领域，隐喻不仅涉及事物表层含义间的简单比较，还关乎两个及以上心理空间之间多元素的跨域映射，这些空间映射既共享某种宏观的对应关系，又融合了事物间的微观领域。在整合过程中，各源空间的元素有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赋予不一样的心理空间以相似性。¹

故事是以广泛的文化和文学符号为特征的隐喻细节，并通过框架结构使听众产生共鸣。Lakoff 和 Johnson 肇始的概念隐喻理论表明：隐喻主题既可以采用经验图式的显性标记语，也可以嵌入所有语言系统的文化规范中，构成隐形框架，使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感觉隐形化，并对这些隐含的经验和概念系统进行明确的批判性反思，进而理解各种生活体验，最终赋予他人行动以特定意义。² 据此，旧故事可以产生新解读，或以新的隐喻主题来看待和体验。相反，新故事亦可为已知事物提供不同的隐喻视角，将未知事物的体验吸收融入现有的隐喻主题当中，以增添新的内涵。

（二）隐喻和叙事

隐喻和叙事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呈现：其一，叙事往往基于隐喻。将一个故事投射到另一个故事的叙事过程离不开隐喻，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构思心灵故事，将所要理解的对象寄托于故事，置于叙述性语境中，以便通过一些微小的、简单的、空间性的叙事故事来描述较为复杂多变的经历。³ 借助隐喻，说话人便能更自然、容易地完成一场叙事，达到交际目的。其二，隐喻使叙事变得含蓄。隐喻叙事根据语境选择性地凸显故事中的某个意象或概念，并且弱化其他概念，进而改变读者的焦点，实现意象凸显化。⁴

二、十四行诗中的意象、隐喻与叙事

意象是指“实体人物外观的再现形态”（佟秋华 183）。文学叙事难免涉及故事和隐喻，隐喻意象是指在文学叙事当中作者蓄意刻画的非直白形象。诗歌中的隐喻，即诗性隐喻“增加了作品的含蓄性、新奇性、生动性

¹ 参见 Gilles Fauconnier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² 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³ 参见 Mark Turner, *The Literary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12.

⁴ 参见 Joseph G. Ponterotto and Steven L. Wise,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the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 (1987): 218-223.

及启发性”（黄曼 147），因而诗性的隐喻意象能向读者传递一定的审美情感，使其在联想过程中体会诗人的内心感受，产生情感共鸣。

十四行诗是济慈最早、最普遍采用的一种诗歌形式，诗中采撷大量隐喻意象用于叙事和抒情，这是读者理解叙事主旨和载体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激发读者寻求新含义，为解读诗歌本意提供了绝佳的媒介。隐喻意象通过具体事物隐喻来表达抽象情感，从而使得叙事抒情含蓄而隐匿。以此判断为契机，本文通过梳理、分类不同的隐喻意象来分析济慈十四行诗作品，从当代隐喻学的视角出发，剖析深沉而精致的诗意图境与意蕴，揭示诗人如何实现形式与内容、理想与现实的完美融合。

（一）自然意象

济慈的十四行诗中充满了自然意象，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植物和动物意象。植物蕴含着欣欣向荣、不屈不挠的积极意义。诗人通过随处可见的植物，如鲜花、树叶、小草等抒发内心情感，《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之日》（“Written on the Day That Mr. Leigh Hunt Left Prison”）第三节的“鲜花”意象有着类似含义：

他在斯宾塞的厅堂和亭院里徜徉，
采撷那令人迷恋的鲜花；
他随同勇者弥尔顿向广袤的天宇翱翔。（45）¹

“鲜花”的源域在叙事作用下折射出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多舛命运。他从光鲜亮丽、力疾从公到锒铛入狱、双目失明，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但现实的苦难并未阻止弥尔顿对信仰的追求，对“鲜花”般的革命的憧憬赋予了诗人坚韧的力量。回归本诗，李亨特因发表批评摄政王的文章被判诽谤罪，身陷囹圄，但其在狱中笔耕不辍，奋力抗争。诗人立足不畏权势、追随弥尔顿步伐的叙事大背景，把自己的抱负融入“采撷那令人迷恋的鲜花”这一叙事活动中。他坚信革命的黎明和曙光终将到来，只要心怀希望，皆有绽放之日。

动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框架襄助诗人表达了内心真实的呼唤。譬如，云雀是自由、张扬、个性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海鲸、苍鹰、野蜂、天鹅、小鹿、鸟儿、翠鸟、蝴蝶、夜莺、鼹鼠、蜜蜂”等，不一而足。在《蝈蝈和蟋蟀》（“On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Cricket”）中，诗人这样描写：

扬起蟋蟀的高歌，而炉温渐高，
听的人慵倦欲睡，迷离惝恍，
仿佛听到蝈蝈吟唱在草山。（75）

¹ 本文有关济慈诗歌的引文均来自 约翰·济慈：《济慈诗选（英汉对照）》，屠岸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低鸣的“蝈蝈”和高亢的“蟋蟀”延续了大地的歌吟，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嘈杂不停的画面。这种描写表面是动物的絮语，实则映射着诗人自身对幸福的渴望，这种渴望无休无止，就像夏日里鸣叫不停的“蝈蝈”和“蟋蟀”。动物纯真的天性以及规律的鸣叫映射着诗人复杂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千百万个“鸣叫”要冲出牢笼，奔向自由。孙毅和周锦锦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认知手段，也是理解自我概念的不二路径。¹作为人类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思维机制，隐喻能使人通过具体的物质载体系统地认识自身，进而清晰快捷地洞察自我概念的本质，以系统深入地了解人类真实生存状态。

（二）拟人意象

在济慈的十四行诗中，拟人意象主要分为两种，即外化的人物意象和内化的感官意象。人物隐喻意象，诸如暴君、枭雄、宠儿、美人、英雄、隐士等，把普通的隐喻意象叠加、错置、整合，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承载无限的情感情绪。“宠儿”是对查特顿的敬爱之情；“暴君、枭雄”揭露了身居高位的统治者贪婪和残暴的丑恶嘴脸，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对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阶级的深切同情。在《漫长的严冬过去了，愁云惨雾》（“After Dark Vapours have Oppressed Our Plains”）中，诗人这样描写“萨福”：

萨福的嫩腮，——熟睡婴儿的呼吸，——
计时的沙漏里慢慢渗下的沙粒，——
林中的小溪，——一位诗人的死亡。（82）

萨福并非婴儿，而济慈将其比作“婴儿”，透露出对这位女诗人的欣赏与呵护之情。这种人物意象的处理，使得作品内涵张弛有度，引人遐想，济慈爱憎分明的个性跃然纸上。

由感官支配的情感在诗歌的叙事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济慈以诗言志，将自身体验与日常概念融为一体，将味觉、嗅觉、知觉、听觉等意象串联成隐喻链条，感官意象打破了常规的隐喻界限，呈现给读者耳目一新的叙事效果。“用心去品尝”“我的精神味觉变麻木”是味觉意象；“清新馥郁”“浓烈芬芳”是嗅觉意象；“头晕”“目眩”是知觉意象；“光焰”“光芒”“新添的煤里乱舔着小小的火舌”“这人简直在发烧”是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尤为丰富，如“海鸟呼啸的高嗓”“欢呼”“亲切的嗓音”等。²另外，诗文中多次出现“歌吟”的听觉意象，例如《英国多快乐！我感到由衷满意》（“Happy is England! I Could be

1 参见 孙毅、周锦锦：“认知隐喻学畛域中汉英自我概念隐喻意涵重塑”，《外语研究》4（2020）：13-21。

2 参见 约翰·济慈：《济慈诗选（英汉对照）》，屠岸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Content”）描述：

但我仍热情如燃，时常想见见
眼含深情的丽人们，听她们歌吟，
同她们一起游向仲夏的清溪。（95）

诸如此类巧妙的叙事意象无一不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的碰撞，现实生活越残酷，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便越强烈，进而经由各种声音所承载的意象体现出来。这些强烈感觉的反差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诗人心灵深处的幽怨、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生活与命运的奋力抗争。

（三）神学意象

济慈的诗作中存在诸多神学意象，其中包括了虚实结合的具体天体意象与虚构神灵意象。一方面，济慈将自然界的多个天体意象融合，体现了“客体感受力”和“物我融合”合二为一的美学想象。《给我的弟弟乔治》（“To My Brother George”）的首节如此叙事：

今天，我已经见到了许多奇迹：
初升的太阳用亲吻抹去了清晨
眼里的泪水；头戴桂冠的诗灵们（59）

第二行的“太阳”映射了靶域中对自己弟弟因病去世的悲惨遭遇而捶胸顿足。“太阳”喻指温暖的兄弟情，人虽故去，亲情永驻，“太阳”般火热的情谊会治愈滴血的伤口，诗人在清晨重新振作。隐喻通过映射将源域中的身体或文化经验图式结构投到抽象的靶域¹，因而普通读者也能够目睹诗人所描绘的画面。

另一方面，济慈是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希腊化的一位，借助大量古希腊文化载体——神灵鬼怪意象铺开叙事。月神、海神、赫尔墨斯等意象的建构使诗人在具身性基础上将个人世界与神话人物融合，亦真亦假，若隐若现地刻画诗歌故事。Lakoff 和 Turner 指出阐述和扩展是诗人在处理共享的概念隐喻时体现隐喻创造力的两种常用概念机制。²《咏梦——读但丁所写保罗和弗兰切斯卡故事后》（“Sonnet—A Dream, after Reading Dante’s Episode of Paulo and Prancesca”）一诗的前两行就阐述了希腊神话中的神灵“赫尔墨斯”和“阿尔戈斯”，拓展了隐喻用法。

¹ 参见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² 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像赫耳墨斯拍起轻捷的翅膀——
这时阿耳戈斯被催眠，昏昏睡去，
我的游魂，把得尔菲芦笛吹响。（119）

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盗贼之神，他机智狡猾，精通骗术，可在飞翅凉鞋的帮助下，持威力十足的魔杖，令人神沉睡或苏醒。诗人借助盗神的这些特异能力隐喻马拉泰斯塔骗取弗兰切斯卡的卑劣无耻行径，弗兰切斯卡的父亲也正如“阿尔戈斯”一般经不住诱惑，被魔杖“催眠”，将女儿许配给马拉泰斯塔，迫使她与相爱的保罗分手。神话人物的叙事隐喻赋予诗歌以浪漫的神话色彩，表达了诗人对这对苦命鸳鸯的深切同情。

（四）其他意象

除了上述几类意象外，济慈仍大量采用了其他意象；例如实物意象与颜色意象。实物意象不仅借实物隐喻叙事，还赋予诗歌更深层次的意境。《如果英诗必须受韵式制约》（“If by Dull Rhymes our English must be Chained”）一诗将实物隐喻与叙事紧密结合，对“镣铐、草鞋、桂冠”等进行勾勒，以追求十四行诗本身的韵律节奏。诗文这样描写：

可爱的十四行必须戴上镣铐，
（……）
编织得更加精美的草鞋穿上：
（……）
枯叶也善于用来编织桂冠。（127）

对实物本义的抽象延伸皆因人类的任何概念均植根于个人经验基础。¹诗人着眼于镣铐、草鞋和桂冠，以人们在生活中切实体验过的实物投射靶域。“镣铐”隐喻地表达了以往诗歌在内容上的局限性，而从穿“草鞋”到戴“桂冠”的身体经验，映射着诗人在诗歌韵式上从“低”到“高”的探索。

济慈诗歌以大量颜色意象给读者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将耀眼斑斓的世界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中，蓝色和绿色在诗人笔下尤为特别，如诗人在《对于一个长困在城里的人》（“To One Who has been Long in City Pent”）中这样描写：

能在蔚蓝苍穹的微笑下面
低声做祷告，这可是多么舒心！
在《刺骨的寒风阵阵，在林中回旋》的第四节，济慈这样刻画：

¹ 参见 孙毅：“跨语言饮食隐喻异同的哲学——文化双轴渊源摭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20）：137-143。

可爱的劳拉身穿淡色的绿衣，
忠诚的彼得拉克头戴光荣的桂冠。（57）

其中，“蔚蓝色”表达了深邃高雅的意蕴，既是大自然和美的融合，亦是西方文明将自己的文化运往世界各地的通道。“绿色”鲜艳、清新，代表着希望和新生。诗歌通过色彩的叙述折射出诗人虽一生备受贫穷和疾病的煎熬，却仍希望摆脱困境、直奔成功。

三、叙事、隐喻和意象的理据考究

隐喻和叙事存在紧密的纽带关系，两者均强调体验的重要性，使得主体与社会的互动成为故事的源泉。隐喻作为一种诗性思维方式和叙事策略，在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通常用熟知的意象表达新生的事物和概念。各类事物的意象图式对读解诗歌以及其中叙事的明晰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以认知体验为驱动的隐喻性叙事

Lakoff和Johnson提出了体验哲学的三大核心思想，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其中“心智的体验性”是核心，也是思维隐喻性的前提条件。¹读者能感受到济慈诗歌所带来的强悍冲击力，究其原因，诗歌中丰富的意象持续强烈地刺激人体神经元，给人以震撼心灵、身临其境之感。当叙事通过隐喻表达高度诗性的意义时，不难看到基于心智体验性的隐喻的巨大张力。比如《致海登（二）》（“Addressed to the Samec [‘Great Spirits’]”）中，诗人感同身受，从隐喻意象“赫尔韦林山”出发，根据自身认知习惯、知识背景、感知经验对语言所传达的信息进行取舍和安排。²表面上诗人叙述群峰林立的赫尔韦林山，实则通过海登负债累累、求果不得、最终自杀的不平一生来隐喻自己的坎坷命运。可见，隐喻和意象在叙事过程中同人类体验即时互动，抑或是认知角度由抽象到具体，再通过具体来构建抽象。在此过程中，抽象的时空维度传输到人的感官，与人的思维和精神产生认知互动，从而使人全方位体悟抽象的对象。³

在诗文中，隐喻通过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表征了文学思维⁴，架设起现实世界与文学诗歌之间的桥梁，使得文学世界和社会生活之间自然切换。诗文中的“赫尔韦林山”意象把诗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寄于外在物质世界的实体，通过对该意象的认知冲破现实叙事的枷锁，进而催化隐喻意义的孳乳。可

1 参见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2 参见 刘文、赵增虎：《认知诗学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3 参见 车明月：“纪伯伦《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母题言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2020）：70-80。

4 参见 付晶晶：“认知隐喻视阈下‘达菲体’诗歌语言之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2019）：59-68。

见，隐喻意象即是诗歌创作的不二法术和独门诀窍。¹济慈借助恰合时宜的叙事策略对源域语言的修辞特征消化吸收，进而用靶域语言替换这种隐喻，加速隐喻意义的再生，从而呼吁大家向海登致敬，替海登鸣冤抱愤，希望“普天各族”不要被“人间市场上大声的嘈杂喧嚷”左右，悉心“聆听”海登的倾诉。²

（二）基于意象图式的叙事隐喻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不是由词汇组成的类聚物，而是由基本命题构成。³一个命题符号意味着一个事实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此语言是世界的图像，即语言图像论。诗歌所表达的绝非单个词语、句子的简单聚合物，而是诗歌整体意境的图像。隐喻意象在叙事背景中产生的图式打破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界限，实现了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跨越。譬如，《给一位赠我以玫瑰的朋友》（“To a Friend Who Sent Me Some Roses”）中，“蔷薇”意象的审美主体焦点不再是鲜花本身的前景化特征：鲜艳、沁人心脾，而是背景化的隐喻意象图式，即蔷薇花期短暂但绽放艳丽。从源域“蔷薇”夏季吐露芬芳、亭亭玉立的现实叙事背景中可窥见靶域诗人自身的境况，即济慈本人虽然才华横溢，但其一生命途多舛，大显身手的时机寥寥无几。该叙事意象的投射离不开意象图式，基于体验的“蔷薇”意象的抽象图式结构在叙事过程中被映射到了诗人具体的现实生活境遇，表明意象图式是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概念的桥梁，对人类认知的推理逻辑至为关键。诗句“蔷薇像仙杖在提泰妮娅手中挥舞”（济慈 51）在读者的脑海中呈现了蔷薇坚毅挺拔的姿态，把感知源域意象的结构投射到抽象的靶域中，形成隐喻，含蓄映射了诗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逃离苦海的信念。因此，意象图式是整个叙事过程想象体验的支撑，具体的诗歌意象被转化为抽象的情感概念，进而传达出诗人的所思所感。济慈诗歌中隐含的这类抽象的、图解式的故事结构以某种方式储存在大脑中，人们从中创造出一个框架或抽象的深层结构模式，在特定情景中这种模式被激活，为其他认知活动奠定基础、提供动力。

（三）叙事隐喻的意象解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济慈十四行诗中的八大叙事隐喻意象可归结为两大类：1、实体意象类，如植物意象、动物意象、人物意象、实物意象；2、感官意象类，如颜色意象、感觉意象、天体意象、神灵意象。这两大类别彰显出诗歌中的隐喻意象在叙事进程中的本质和功用（如图 1）。

1 参见 孙毅、梁晓晶：“崔致远诗歌意蕴的当代隐喻学重构与新释”，《东疆学刊》3（2020）：108-114。

2 参见 约翰·济慈：《济慈诗选（英汉对照）》，屠岸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 71 页。

3 参见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89-214 页。



图1 济慈十四行诗意象解构图

首先，在实体意象中，以植物类意象为例，鲜花被暴风雪摧残的叙事在源域“玫瑰”和“鲜花”的隐喻意象和诗人对查特顿昙花一现的人生靶域之间勾连起特定联系，使诗歌内涵通过日常生活意象传达出来，利于理解；在动物意象类中，隐喻结构通过联想产生，诗人借助源域“云雀”、“苍鹰”、“夜莺”等特殊文化框定下的动物作为发声者映射靶域刻画出西方独有的隐喻意象，传达了特定的思想内涵。在人物意象类中，诗文自身隐喻化为诗意图解因文制宜，灵活多变性奠定了基调，不再限于语境不够充足而无法确定、准确的解读，而是借助人物迅速锚定首选含义¹，“暴君枭雄”的人物意象即是佐证。在众多意象图式中，叙事自身的隐喻化诱发了居于首位的诗意图解，屏蔽了其他意象图式的干扰，故而映射出靶域诗人对统治者的愤懑。在实物意象类中，诗人借助“镣铐”和“铁链”的源域，映射了自己孱弱多病、一贫如洗、情场失意、屡遭非议、曲折多舛的一生，这些难以挣脱的枷锁使他一生困顿凄苦。Prakas指出：“隐喻是一种高效、长久、稳定的机制，也可以通过诗文中的发声者带给读者无穷多变的诗意图解”（437）。正如孙毅所言，在特定语言中，每个概念区间都包含释解某一具体隐喻概念中最恰当的图式。²可见，隐喻之于诗歌或广义上的文学叙事，乃至其他类别的叙事，可谓人类须臾难离的一种基本心理机制与概念能力。

其次，就感官意象而言，在颜色意象中，诗人基于自身体验和物理认知获取内心感知，对浓艳瑰丽的色彩进行整合，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读者身上，使其自动生发意识。³这些色彩意象冲击读者的视觉感官神经，烘托出诗人对风雨如晦的黑暗势力的鞭挞，对光明前途的憧憬。隐喻从本质上来说属于认知范畴，它“不单是一个纯语言的问题，而是我们认知能力的扩展，即从基本经验到非基本经验范畴的扩展”（刘立华 刘世生 74）。在感觉类意象中，诗人只有借助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知觉与外部世界交互，才能推动一种与世界的节奏、万物的声响、内心的欲望、信息的流通同步的诗歌

¹ 参见 Tessie Prakas, “In Forgetting Thou Rememb’ Rest Right’: Metaphor and Mis-devotion in John Donne’s Songs and Sonnets,”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3 (2019): 435-453.

² 参见 孙毅：“涌现隐喻理论学术路向：基于使用的认知研究新范式”，《外语研究》1 (2021)：15-23。

³ 参见 M. Turner, “The Origin of Selkie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1 (2004): 90-115.

实践。¹诗歌中的很多意象都依赖于空间关系和运动经验，正是与这些认知意识相关的感官隐喻意象给平淡无趣的叙事结构增添了几分趣味，使读者在三维立体的画面中品味诗篇；在天体类意象中，诗人对日月星辰的叙述韵高意深，用其映射靶域概念，即诗人的手足情深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诗人将身体、大脑同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并结合理性，感知和判断这些天体的特征，在人们熟知的天体意象和诗人隐藏的内心情怀之间建立勾连；在神灵类意象中，叙事的投射过程依赖空间故事的意象图式，思想是愿望和行动的源泉，做事是为了抵达目的地，方法是朝向目的地的路径。对希腊神话中神灵的叙事更是有如天助，借助寓言整合的故事计划、解释、预测未来，构建我们的思想，这些神圣的神灵意象经过重组和排列被投射到其他叙事中，创设出独特的隐喻意象，映射出现实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漠。可见，隐喻是一种有效策略，可以使诗意图解免受时空的干扰；发声者的作者身份并未在诗意图解时终止，而是跨越时空继续延展，在隐喻互动的力学作用下重组。²

四、结语

隐喻是人类核心的认知和概念化机制。诗歌依托隐喻叙事，把稀松平常的概念融入隐喻意象，串联成一条紧密衔接、首尾相连的隐喻链。隐喻在诗歌的组织和发展中起着结构性作用，其功能亦繁纷复杂：隐喻的认知特征有助于组织诗歌内容的基本信息；情感特征可以引导读者评价信息内容；语用特征能够引导诗歌文本的语篇动向，从而巩固诗歌的文本结构。济慈十四行诗主要借助八种隐喻意象，内涵隽永、意义生动地构筑了一个爱与恨、美与丑交织的万花筒般的世界，映射着人类对精神困境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诗人从自身经验出发，倚重十四行诗这根魔法杖，将磨难和郁闷抛向世界中的实体，最终凝汇成一部部意象丰富、意蕴深厚、脍炙人口的传世诗篇。

叙事中潜藏着的写作手法和思路引导着读者识解诗歌。济慈将自身跌宕起伏的现实生活体验凝结成认知心理历程，以叙事的方式，借助各类隐喻意象刻画在语言表达之中。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隐喻意象不难达到以小见大、以浅抵深的叙事效果，使得诗人坎坷多舛的一生在诗歌中呈现得更为立体与鲜活。叙事、隐喻和诗歌意象密不可分，隐喻阐述并澄清叙事故事中的特定观点，叙事则在某些情况下借助隐喻阐释诗歌意象，在看似独立的隐喻之间建立起耐人寻味的表意联系，三者休戚相关。

Works Cited

Bate, Walter J. *John Keats*. London: Oxford UP, 1963.

1 参见 付晶晶：“认知隐喻视阈下‘达菲体’诗歌语言之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2019）：59-68。

2 参见 T. Prakas, “In forgetting thou rememb’ Rest right”: Metaphor and Mis-devotion in John Donne’s Songs and Sonnets,”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3 (2019): 435-453.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eds.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80.

—.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Lakoff, George and Mark Turner, eds. *More than Cool Reason*.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89.

Ponterotto, Joseph and Steven L. Wise.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the Racial Identity Attitude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 (1987): 218-223.

Prakas, Tessie. “‘In Forgetting Thou Rememb’ Rest Right’: Metaphor and Mis-devotion in John Donne’s Songs and Sonnets.”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3 (2019): 435-453.

Ritchie, David L. “Gateshead revisited: The Integrative Function of Ambiguous Metaphors in a Tricky Political Situ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1 (2008): 24-49;

Ritchie, David L. and Char Schell. “‘The Ivory Tower’ on An ‘Unstable Foundation’: Playful Language, Humor, and Metaphor in the Negotiation of Scientists’ Identities.” *Metaphor and Symbol* 2 (2009): 90-104.

Snaevarr, Stefan. *Metaphors, Narratives, Emotions: Their Interplay and Impact*. New York: Rodopi, 2010.

Turner, Mark. *The Literary Mind*. Oxford: Oxford UP, 1996.

—. “The Origin of Selkie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1 (2004): 90-115.

Wolfson, Sus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a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车明明：“纪伯伦《沙与沫》中诗性隐喻的母题言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 (2020) : 70-80。

[Che Mingming. “The Motifs of Poetic Metaphors in Gibran’s Sand and Foam.”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6 (2020): 70-80.]

付晶晶：“认知隐喻视阈下‘达菲体’诗歌语言之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 (2019) : 59-68。

[Fu Jingjing. “On the ‘Duffyesque’ Poetic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4 (2019): 59-68.]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Hu Zhuanglin. *Metaphor and Cognition*. Beijing: Peking UP, 2004.]

黄曼：“论《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的伦理隐喻”，《外国文学研究》4 (2013) : 146-151。

[Huang Man. “Ethical Metaphors in *Life of Pi*.”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3): 146-151.]

刘立华、刘世生：“语言·认知·诗学——《认知诗学实践》评介”，《外语教学与研究》1 (2006) : 73-77。

[Liu Lihua and Liu Shisheng. “Language, Cognition, Poetics: Review of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 (2006): 73-77.]

刘文、赵增虎编：《认知诗学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Liu Wen and Zhao Zenghu, eds. *A Study on Cognitive Poetic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4.]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涂纪亮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Tu Jiliang. *L. Wittgenstei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罗益民、刘佯：“长诗传统与济慈诗歌中的拓扑学空间构建——以《恩底弥翁》的得失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 (2021) : 71-91+15。

[Luo Yimin and Liu Yang. “The Long Poem Tradition and the Topological Space Construction of Keats’s-A Case Study of *Endymion*: A Poetic Romance.”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6 (2021): 71-91+15.]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Shu Dingfang. *Studies in Metapho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孙毅：“跨语言饮食隐喻异同的哲学——文化双轴渊源摭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2020) : 137-143。

[Sun Yi. “A Stud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Food and Drink Metapho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the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2020): 137-143.]

——：“涌现隐喻理论学术路向：基于使用的认知研究新范式”，《外语研究》1 (2021) : 15-23。

[—. “The Academic Direction of Emergent Metaphor Theory: A New Usage-based Paradigm of Cognitive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1 (2021): 15-23.]

孙毅、梁晓晶：“崔致远诗歌意蕴的当代隐喻学重构与新释”，《东疆学刊》3 (2020) : 108-114。

[Sun Yi and Liang Xiaojing. “Reconstruction and New Explanation of Choi Chi-won’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Metaphorology.” *Dongjiang Journal* 3 (2020): 108-104.]

孙毅、周锦锦：“认知隐喻学畛域中汉英自我概念隐喻意涵重塑”，《外语研究》4 (2020) : 13-21。

[Sun Yi and Zhou Jingjing. “Reconstruction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Self-concep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ology.”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 (2020): 13-21.]

佟秋华：“论古典诗歌意象的语用功能”，《学术交流》6 (2020) : 183-190。

[Tong Qiuhua. “On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Images of Classical Poetry.” *Academic Exchange* 6 (2020): 183-190.]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Tu Jiliang. *L. Wittgenstei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约翰·济慈：《济慈诗选（英汉对照）》，屠岸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Keats, John. *Selected Poems of John Keats*, translated by Tu 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